

国风

诗经

今注今译

王延海 译注

雅

河北人民出版社

颂

王延海 译注

诗经今注今译

鄧洪信校題



河北人民出版社

其不自王也故能... 善和萬物... 有般居用七... 夫光... 而... 社

卷之三... 王延海... 译注... 鄧洪信... 校題... 河北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诗经今注今译/王延海译注. —石家庄: 河北人民出版社, 2000. 1

ISBN 7-202-02528-0

I. 诗… II. 王… III. ①诗经-注释②诗经-译文 IV. I
222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1999) 第 73385 号

书 名 诗经今注今译

作 者 王延海 译注

责任编辑 张 琦

美术编辑 吴书平

装帧设计 宋丕胜

责任校对 张三铁

出版发行 河北人民出版社

(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 330 号)

印 刷 河北新华印刷一厂

开 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

印 张 28.5

版 次 2000 年 1 月第 1 版

200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 1-5000

书 号 ISBN7-202-02528-0/1·542

定 价 49.0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● 《诗经》概说

中国素以诗国著称于世，在其琳琅满目争奇斗艳的诗苑中，《诗经》是最先盛开的一朵奇葩，是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。它的出现拉开了中国文学的序幕，标志着中国诗歌的发展进入了全新的鼎盛时期。无论就《诗经》内容的深广而言，抑或视其诗艺的水准而论，它都达到了空前的高度，甚至竟令后人“不可及也”（王夫之《诗译》）。所以明朝陈第在其《读诗拙言》中高度赞美《诗经》说：“《诗》虽三百篇，然牢笼天地，囊括古今，原本物情，讽切治体，总统理性，阐扬道真。廓乎广大，靡不备矣；美乎精微，靡不贯矣。”这使《诗经》确实成了群星璀璨的中国诗苑中的“焯乎如日月”（朱松《上赵漕书》）的明星，成了“独绝千古”的“天籁”（袁枚《随园诗话》），使“天下后世，舍《三百篇》则无以为法”（贡师泰《重刊石屏先生诗叙》），在中国文学史上确立了它的崇高地位，为中国文学赢得了巨大的世界声誉。

一、《诗经》的基本知识

1. 《诗经》的名称

在先秦时期，《诗经》只称《诗》，或称《诗三百》。《论语·为政》说：“子曰：‘《诗三百》，一言以蔽之，曰：思无邪！’”《论语·泰伯》曰：“子曰：‘兴于《诗》，立于礼，成于乐。’”《孟子》、《墨子》、《荀子》等书也这样称呼《诗经》。虽然孔丘、荀况偶称《诗》为“经”（见《庄子·天运》、《荀子·劝学》），但是《诗经》之名并未在先秦通行。到了汉代，统治者崇尚儒学，遂把《诗》称为《诗经》（《史记·儒林传》），并沿用至今。当然此后也不乏称《诗经》为《诗》、《诗三百》者，也有简称《三百》、《三百篇》者，甚至尚有以《风》代称《诗经》者，但以《诗经》为通用之名。

2. 《诗经》产生的年代

据王国维《观堂集林·周大武乐章考》的考证，《诗经·周颂》中的《武》、《桓》、《赉》、《酌》、《般》、《我将》六首诗（明朝何楷《诗经世本古义》有《时迈》而无《我将》），确为周武王克商时的庆功之歌；今人多从之，认为这是《诗经》中最早的诗，当产生于周初，即公元前11世纪中叶。《诗经·陈风·株林》描写陈灵公通淫夏姬之事（《毛诗序》），而《左传·宣公九年、十年》、《史记·陈杞世家》皆载其事，灵公被杀事在公元前599年，今人多从此说，以为《株林》为最晚之作，当在公元前6世纪中叶。由此可见，《诗经》收录的305首诗，大约产生于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的五百年间。

3. 《诗经》的地域

《诗经》中的诗产生于很广的地域，其中十五《国风》中二《南》之地，在今河南临汝、南阳，湖北之襄阳、宜昌、江陵一带；邶、鄘、卫三《风》之地，在今河北磁县，山东东明，河南的濮阳、安阳、淇县、滑县、汲县、开封、中牟等地；《王风》之地在今河南洛阳、孟县、沁县、偃师、巩县、温县等地；《郑风》之地在今河南新郑一带；《齐风》之地在今山东中部与北部地区，而以今淄博为中心；《魏风》之地在今山西芮城一带；《唐风》之地在今山西太原一带，或说包括翼城、曲沃、绛县、闻喜等地；《秦风》之地在今陕西地区与甘肃（天水一带）东部地区；《桧风》之地在今河南密县东北地区；《陈风》之地在今河南淮阳、柘城及安徽亳县一带；《曹风》之地在今山东西南部菏泽、定陶、曹县一带；《豳风》之地在今陕西旬邑、彬县一带。《雅》诗之地主要在今陕西以西安为中心的地区；当然有的诗可能产生于东都洛阳一带。《周颂》之地在今陕西西安一带；《鲁颂》之地在今山东曲阜地区；《商颂》之地在今河南商丘地区。可见《诗经》主要是黄河中下游地区的作品，具体说在今河北、河南、山东、山西、陕西、甘肃、安徽、湖北地区。

4. 《诗经》的篇数与题目

今所传的《诗经》篇目共 311 首，即《国风》160 首，《小雅》80 首，《大雅》31 首，《周颂》31 首，《鲁颂》4 首，《商颂》5 首。但是《小雅》中的《南陔》、《白华》、《华黍》、《由庚》、《崇丘》、《由仪》6 首诗，实际上有目无辞，被称为“笙诗”，故《诗经》实有 305 首诗。

这些诗篇的命名，没有严格规律，因为“古之人于诗多不命

题，而篇名往往无义例”（欧阳修《诗本义》）。就《诗经》篇名来看，一般皆取每首诗的首句中的一字、二字或全句来命名。取一字者如《氓》、《丰》、《还》、《著》、《绵》、《板》、《荡》、《抑》等；取二字者如《关雎》、《卷耳》、《鹿鸣》、《公刘》、《清庙》、《閟宫》、《玄鸟》等；取全句者如《麟之趾》、《野有死麇》、《皇皇者华》、《文王有声》、《维天之命》等。也有取诗中不相关联的两字为题者，如《召旻》诗，“首章称‘旻天’，卒章称‘召公’，故谓之《召旻》，以别《小旻》也。”（朱熹《诗集传》）《韩奕》也如此。还有不从诗句中取字为名，而另加篇名者，如《雨无正》、《酌》、《般》、《赉》等。也有以官名或诗的内容来命名的，如《巷伯》、《巧言》等。还有在篇首加“小”、“大”来区别《小雅》、《大雅》者，如《小旻》、《小宛》、《小弁》、《小明》等诗，皆明其为《小雅》之诗；而《大明》则明其为《大雅》之诗，所谓“盖对《小雅》有《小明》篇而言”（马瑞辰《毛诗传笺通释》）。值得注意的是《诗经》中有些重名诗，如《邶风》、《鄘风》皆有《柏舟》；《邶风》和《小雅》皆有《谷风》；《郑风》有《叔于田》和《大叔于田》；《王风》、《郑风》、《唐风》皆有《扬之水》；《郑风》、《唐风》和《桧风》皆有《羔裘》；《齐风》、《小雅》皆有《甫田》；《唐风》有《杖杜》、《有杖之杜》，而《小雅》有《杖杜》；《唐风》和《秦风》皆有《无衣》；《小雅》有两首《白华》。这说明这些诗在集中于太师手中之前，就已经有了题名。

5. 《诗经》的作者

《诗经》基本上是集体的歌唱，特别是《国风》部分。因此，作者的名字难以指出。在305首诗中，只有几首诗中提到了作者的名字，即家父作《节南山》、寺人孟子作《巷伯》、尹吉甫作

《崧高》和《烝民》、奚斯作《閟宫》等。另外，《毛诗序》、《左传》等书指出《载驰》为许穆夫人作，《桑柔》为芮良夫作，这些说法有史料为证，是可信的。又《毛诗序》、《左传》、《诗集传》等书中还提到另外一些所谓《诗经》的作者，如孔丘、卫武公、周公、召康公、苏公、召穆公、凡伯等等，皆是“未有据”（朱熹《诗集传》）的说法，都不可信，或不甚可信，只能参考而已。

6. 《诗经》的编辑和流传

人们谈到《诗经》的篇数，往往要提到孔子删《诗》的事。司马迁在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中说：“古者，诗三千余篇，至孔子去其重，取可施于礼义……三百五篇，孔子皆弦歌之。”后来的欧阳修和郑樵、马端临、王应麟等皆信之。实际上这种孔子删《诗》的说法，显然不可信。因为《左传·襄公二十九年》明确记载着吴国季札去鲁国观乐的史实。鲁国为季札所奏之乐，其《风》、《雅》、《颂》的体制与篇目顺序，与今所传《诗经》的体制与篇目顺序基本相同，而当时孔丘只有8岁，不可能进行删《诗》工作。这说明在孔子出生前，今所传《诗经》已基本定型。孔丘可能作过“正乐”的工作，这是孔子在《论语》里说过的事，但却未删《诗》。唐代学者孔颖达首疑《史记》之说，其后朱熹、叶适、崔述、魏源等皆证成孔说，当从之。

那么《诗经》是怎样编辑成书的呢？据《礼记·王制》、《汉书·食货志》和《汉书·艺文志》、何休《公羊传·宣公十五年》注、《国语·周语》和《国语·楚语》、《国语·晋语》等书的记载，中国古代确有采诗、献诗、陈诗的制度。这种制度使民间流传的诗歌、各级官吏的诗作，最后都集中到王朝音乐长官太师那里，并由太师一类人编选整理，逐步辑成《诗经》一书。辑成《诗

经》的最后时间大约在公元前6世纪中叶。

《诗经》有了定本之后，得以广泛流传。它首先成为贵族子弟的教科书，同时成为各国士大夫朝聘会盟、宴饮欢聚、外交应对时的必备知识，成为文人著书立说的必引之诗，成为知识分子人人熟诵的诗作。故虽经秦火焚烧的厄运，但是到了汉代，《诗经》仍然被完好地保留下来，成为先秦传下来的最可靠的典籍，并被广泛传授。早在汉文帝时，就有鲁人申培传《鲁诗》，文帝立申培“为博士”（《太平御览》卷二三二引《鲁国先贤传》），教授弟子。另有燕人韩婴传《韩诗》，文帝立之“为博士”（《史记·儒林传》），教授弟子。汉景帝时有齐人轅固传《齐诗》，景帝立之“为博士”（《史记·儒林传》），教授弟子。后人称以上三种《诗》为“三家诗”，且因三《诗》皆用汉代通行的隶书录写，故又称为今文《诗经》，皆盛极一时。至西汉末年，刘歆倡导古文（先秦六国文字）经学，遂有相传是子夏作序、毛亨作传、毛萇传授的以古文录写的《毛诗》行于世，被称作古文《诗经》。毛萇被河间献王立为博士，但《毛诗》仍未被官方所接受，未立学官。至汉平帝时始立《毛诗》博士（《汉书·儒林传》）。其后东汉大儒郑众、贾逵、马融皆为《毛诗》作注，郑玄又作《毛诗传笺》，遂使“学者笃信康成（郑玄），故此书（指《毛诗》）专行”（郑樵《诗辨妄序》），独传至今，而《三家诗》皆先后亡佚。据《隋书·经籍志》记载，《齐诗》亡于曹魏，《鲁诗》亡于西晋，最后亡者为《韩诗》，但至隋时也只有今所传《韩诗外传》行于世。所以，今所见《诗经》，实为毛氏独家之学。

7. 《诗经》的分类

《诗经》的分类是个有争议的复杂问题，宋人程大昌《诗论》以为“《南》、《雅》、《颂》之为乐诗，而诸国之诗为徒诗（不人

乐”。朱熹《诗集传》、顾炎武《日知录》（卷三）等书皆谓《诗经》有人乐和不入乐之别。但是，古人多说《诗》皆入乐，早者如《墨子·公孟》即说：“诵《诗三百》，弦《诗三百》，歌《诗三百》，舞《诗三百》。”司马迁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也说：“三百五篇，孔子皆弦歌之。”清儒马瑞辰《毛诗传笺通释·诗入乐说》、俞正燮《癸巳存稿·诗入乐》、皮锡瑞《经学通论·诗无不入乐》、今人顾颉刚《论〈诗经〉所录全为乐歌》、张西堂《〈诗经〉六论·〈诗经〉是中国古代乐歌总集》等，皆主《诗经》之诗全部入乐说，这已成定论，为今人所接受。

按用乐的性质，《诗经》分为三类，即《风》、《雅》、《颂》。《风》有十五《国风》，皆为不同地区的地方乐调，所谓“风土之音曰风”（郑樵《六经奥论》卷三），或称“土乐”（顾颉刚说），或称“里巷歌谣”（朱熹《诗集传序》），如《齐风》即山东小调之意。《雅》也是“乐歌名”（王质《诗总闻》），是“天子之诗”、“天子之乐”，也就是“朝廷之音”（郑樵说）。雅者，正也。雅与“夏”古通用，雅声即夏声，也即“中原正声”（梁启超《释四诗名义》），就是周王朝直接统治地区的官方乐章。《雅》有大小之分，也当以音乐为别（惠周惕《诗说》），《大雅》可能是旧有的乐章，《小雅》可能是后起的乐章。至于《毛诗序》以“政有大小”区分大小《雅》，苏轼、严粲以辞体区分大小《雅》，郑玄、苏辙、陆九渊、邓元锡等以道德或法理等区分大小《雅》（何楷《诗经世本古义》引文），皆未有确据，不可信。《颂》有《周颂》、《鲁颂》、《商颂》之别。《周颂》为周初之诗，《鲁颂》为春秋前期鲁国之诗，《商颂》为春秋前期宋国之诗，这早已由清人魏源、皮锡瑞和王先谦及近人王国维、梁启超等所证实（公木、杨公骥两先生力主《商颂》为商诗说，也可备一说）。“颂”为“容”字之借字，清代阮元《释颂》释为“样子”，如《周颂》即

“周之样子”，实指参加祭祀者所表演的舞姿形态，则三“颂”皆宗庙祭祀时所用乐舞之曲。王国维《说周颂》进一步考证了《颂》乐的特点为舒缓，故《周颂》诗多短而不分章，也多不押韵。其说可信。

对于《诗经》的分类，自古至今有四分法，即南、风、雅、颂四类。程大昌始言“南”为《诗》之一体，苏辙则说《诗》有南、风、雅、颂四诗。其后颇有信者，至清代尚有崔述《读风偶识》、近人梁启超《释四诗名义》力主四诗说。且郭沫若在其《甲骨文研究·释南》中，释“南”为“铃”，可信。则“四诗”之说多有信者。其实，“南”既为乐器，则从乐器“南”演化来的乐调，仍可视作地方乐调，大可不必另立“南”为一类。《诗经》分类当以《风》、《雅》、《颂》三类为是。

8. 《诗序》问题

《毛诗》在长期流传过程中，在后世学者研究过程中，逐渐形成了各篇的序言，并被记录在每首诗的首句之前，被称为《诗序》，或称《毛诗序》，以别于《三家诗》之序（魏源说《三家诗》也有序）。关于《诗序》的作者，大约有二十多种说法。有以为子夏作《大序》，毛公、子夏合作《小序》（《释文》引沈重所述郑玄《诗谱》之说），有以为子夏一人所作者（孔颖达《毛诗正义》），有以为“村野妄人”作者（郑樵《诗辨妄》），有以为孔子、毛公所作者（王得臣《麈史》）等等。其中《后汉书·儒林传》明文记载的卫宏“从谢曼卿受学，因作《毛诗序》，善得《风》、《雅》之旨，于今传于世”的说法，是比较可信的。《诗序》向有大、小之别，汉代与宋代人说法不一。《关雎》之前有一长篇序文，除解释《关雎》题旨外，尚有概述全部《诗经》之义的一段文字，宋人称之为《诗大序》。《诗经》第二篇（《葛

章》)以后,每首诗之前有一小段题解式的序文,宋人称为《小序》。今人多信宋人之说。《毛诗序》有其可取之处,但却存在着穿凿附会的严重毛病,往往歪曲诗旨。对于今人来说,《毛诗序》多不可取。

9. 四始、六义与“变风变雅”

前人研究《诗经》,向有四始、六义和《风》、《雅》正变之说。四始之说不同,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以为《关雎》是《风》之始,《鹿鸣》是《小雅》之始,《文王》为《大雅》之始,《清庙》是《颂》之始。这种说法较普遍,只有《齐诗》有异说:《大明》为水始,《四牡》为木始,《嘉鱼》为火始,《鸣雁》为金始(《诗纬》)。《齐诗》之说歪曲了《诗经》研究的正确方向,没有任何积极意义。

“六义”是汉人研究《诗经》时提出的一种说法,如《诗大序》本之《周礼·春官·大师》的“六诗”说,曰:“《诗》有六义:一曰风,二曰赋,三曰比,四曰兴,五曰雅,六曰颂。”其中风、雅、颂是《诗经》的分类,朱熹称之为“三经”。赋、比、兴是《诗经》的艺术手法,朱熹称之为“三纬”(《朱子语类》)。“六义”之说对《诗经》研究有一定意义。

《毛诗序》提出了所谓“变《风》变《雅》”之说。汉代郑玄以国家治乱为据,把《周南》和《召南》称为“正风”,把另外十三《国风》称为“变风”。他又把《鹿鸣》至《菁莪》共16篇诗称为“正小雅”;把《文王》至《卷阿》共18篇诗称为“正大雅”。把《六月》至《何草不黄》共58篇诗称为“变小雅”;又把《民劳》至《召旻》共13篇诗称为“变大雅”。与此相联系,汉人又提出“美刺”之说,把《诗经》的诗分为“赞美”和“讽刺”两种。这些说法对《诗经》的研究有一定积极意义。

二、《诗经》是周代社会的形象史

《诗经》的内容“宏大博远”（张表臣《珊瑚沟诗话》），“牢笼天地，囊括古今”（陈第《读诗拙言》），它从不同侧面形象生动地再现了周代社会的生活，确为周代社会的一面镜子，一部形象史。

1. 《诗经》反映了商周统治者的思想

《雅》、《颂》中的很多诗，突出地表现了商周统治者的天命思想。他们总是把自己说成为“天之骄子”，“允也天子”（《长发》）。他们高唱“君权神授”的赞歌，说“天命玄鸟，降而生商”（《玄鸟》），“有命自天，命此文王，于周于京”（《大明》）。他们把天说成是有意识的人格神，说“明明上天，照临下土”（《小明》），“皇矣上帝，临下有赫。监观四方，求民之莫”（《皇矣》）。天视下界情况可降灾或赐福，“昊天不佣，降此鞠讟。昊天不惠，降此大戾……不吊昊天，乱靡有定。式月斯生，俾民不宁……昊天不平，我王不宁”（《节南山》）。“天降丧乱，灭我立王”（《桑柔》）。“自天降康，丰年穰穰”（《烈祖》）。为了避免天的惩罚，他们必须“小心翼翼，昭事上帝”，“无贰尔心”（《大明》），“不敢怠遑”（《殷武》），“好是懿德”（《烝民》），“顺帝之则”（《皇矣》），方可“聿怀多福”（《大明》），“骏命不易”（《文王》），永远保持统治地位。

另外，商周统治者的重农思想、敬贤重德和民本思想等，也都在诸如《七月》、《楚茨》、《信南山》、《甫田》、《载芣》、《良耜》等诗中，表现得很鲜明。

2. 商周的史诗

《雅》、《颂》中的《玄鸟》、《长发》和《生民》、《公刘》、《皇矣》、《绵》、《大明》、《崧高》、《烝民》、《韩奕》、《江汉》、《常武》等皆为商周的部族史诗。如《生民》写周始祖后稷降生的灵异，以及他教民稼穡的史实，反映了中国古代劳动人民创造物质文明的伟大智慧和力量。《公刘》写周人另一先祖公刘率民迁豳，并开发新地的史实；《绵》写古公亶父率民由豳迁岐的史实；《皇矣》、《大明》则写文王、武王灭商的过程。这些诗用粗线条勾勒出周部族兴起发展的脉络，让读者清晰地看到周族历史车轮的印迹，具有鲜明的史诗性质。当然中国的史诗与西方的《荷马史诗》不同，具有我们这个民族的文化特点。这些诗所描写的历史人物，都具有神奇的特点，具有人神杂糅的神话色彩。他们都是智慧的化身，都有开拓创业的精神，具有战胜困难、征服自然的愿望和毅力。读者在他们身上可以看到中国人民的伟大，看到中国历史的辉煌。

3. 表现人民的苦难、不满与反抗

《诗经》中反映人民苦难的诗很多，如《七月》全面描写了西周前期的奴隶们一年四季的艰苦劳动，写出他们身体和精神受摧残，记述他们无衣无食的艰难生活。同时揭示了奴隶主无偿占有奴隶的劳动成果、残酷盘剥和榨取奴隶血汗的罪恶史实，表现了当时阶级矛盾的尖锐，揭露奴隶制度的不合理，在一定程度上也表现了奴隶的不满。《伐檀》和《硕鼠》比《七月》更深刻地表现了人民的不满。伐木者已经公开嘲讽不劳而获的剥削者：“彼君子兮，不素餐兮。”冷语相讥，不满之情、反抗之意溢于言表。《硕鼠》则把剥削者比作不劳而获的田鼠，并高喊“适彼乐

土”，“适彼乐国”，“爰得我直”的要求，反映了此时人民的觉醒以及他们有意识的反抗，这是人民反压迫反剥削思想的升华。从《七月》到《硕鼠》，反映了周代社会发展和人民反抗统治者的斗争合理而必然的进程。

4. 表现人民对兵役与徭役的不满

周代的兵役与徭役是繁重的。当时“戎狄交侵，暴虐中国，中国被其苦”（《汉书·匈奴传》）。服役者“久者经年，速者数月，男女久不相见”（《墨子·节用》）。往往“起一人之繇，百亩不举；起十人之繇，千亩不举”（《管子·臣乘马》）。给社会生产和家庭生活带来不幸。《君子于役》和《伯兮》等诗，从女性的角度揭示了兵役与徭役给人民带来的痛苦；《鸛羽》、《击鼓》、《王风·扬之水》、《陟岵》等诗，从男性的角度揭示出兵役、徭役给社会生产和家庭生活带来的灾难；《采薇》则从更广泛的层面揭示了兵役和徭役给社会、家庭、民族关系等方面带来的更大灾难。这些诗都共同对“夙夜无已”（《陟岵》），“不知其期”（《君子于役》），“王事靡盬”（《鸛羽》）的征役表示了强烈不满，因为这使他们“不能艺稷黍”，将使“父母何怙”（《鸛羽》），致使妻子“首如飞蓬”（《伯兮》），使战士“不遑启处”（《采薇》），“敦彼独宿”（《东山》）。总之，使社会生活、农业生产遭受严重破坏，人民蒙受极大苦难，造成了社会的动荡。

5. 劳动的赞歌

《诗经》的《国风》多是“小夫贱妇”、樵夫渔子的诗，因而有的诗就是描写他们的劳动、生活的。如《芣苢》写一群妇女采摘车前草的劳动场面，气氛热烈，感情真挚。《十亩之间》写采桑姑娘劳动后的欢快喜悦。《七月》写农奴耕田、种谷物、采桑、

盖屋等种种劳动过程。有些农事诗，如《良耜》、《载芟》等，也都不同程度地写农夫的劳动。这些诗都表现出我国劳动人民勤劳智慧的美德，反映了他们创造物质文明的功绩。

6. 鞭挞统治者的丑恶

历代统治者总是高唱仁义，标榜美德，实际上他们寡廉鲜耻。《南山》、《新台》、《墙有茨》、《株林》等诗，都揭露和抨击了最高统治者乱伦纵欲的丑行：兄妹通奸杀夫，公公强娶子妻，儿子通淫继母；君臣同与大臣之妻私通，酿成杀君之祸。《秦风·黄鸟》写秦穆公用 170 多个活人殉葬的史实，表现出统治者的极端残酷和永无休止的奢欲，令人发指。《宾之初筵》写出贵族纵酒无行的丑态。《巷伯》和《巧言》、《小弁》、《何人斯》等也都不同程度地揭示出贵族统治者的种种丑恶。

7. 揭示贵族的阴暗心理和没落之感

《诗经》中的某些诗反映了没落贵族或失意贵族的心理活动。如《黍离》倾诉诗人的故国沦亡的哀思；《权舆》写没落贵族对逝去的天堂生活的留恋，对“今也每食无余”、“今也每食不饱”、“不承权舆”的现实生活的深深感伤和不满，表现其厌世的心理；《山有枢》写贵族的贪婪和吝啬，表现了中国古代的阿巴公式的人物的心理活动，同时宣扬及时行乐的没落思想；《蟋蟀》也反映了贵族阶级的及时行乐思想。这类诗多表现没落贵族的颓唐情绪。

8. 爱国主义思想的赞歌

爱国主义是永恒的诗歌主题，《诗经》也不乏这类内容。《秦风·无衣》写战士们同仇敌忾，相互鼓舞，奔赴战场，保卫国家，

建功立业，洋溢着强烈的爱国激情，是杰出的古代战歌。《载驰》是中国第一位女诗人许穆夫人的作品，写她为拯救沦亡的祖国而奔波的经历与感受，表现了她真挚的爱国之情。《采薇》、《出车》、《采芣》、《江汉》、《常武》、《六月》等诗，都热情描绘了抗击敌人、保卫国家的统一与安全的周军，赞美了广大战士和诸如周宣王、大将南仲等君王与将帅的功绩，字里行间流露出一种正义感与自豪感，表现出爱国之情。

9. 反映贵族之间的矛盾与斗争

《诗经》中，特别是《雅》、《颂》中的一些产生于周厉王、周幽王时代的作品，都深刻地揭示了贵族之间的矛盾。《小星》与《式微》写小官吏对周王的不满；《北门》写官吏对繁重政事不堪承受的抱怨；《北山》对统治阶级内部的劳逸不均、待遇不公表示了强烈的怨恨；《权舆》写没落贵族对当今统治者的不满。又如《节南山》、《正月》、《十月之交》、《雨无正》、《小旻》、《巧言》、《巷伯》、《大东》、《北山》、《民劳》、《板》、《荡》、《抑》、《桑柔》、《瞻印》、《召旻》等诗，都从不同的角度揭示了周王朝内部君与臣、大臣之间、大臣与小官吏、得志官吏与失意官吏、保守腐朽官吏与开明官吏、周王朝与诸侯国之间的种种矛盾。如《桑柔》形象地再现了昏君周厉王重用荣夷公之流所造成的社会矛盾，诗人芮良夫特别指出人民的“未戾”（不善），是厉王重用奸佞的结果，是官逼民反的必然，表现了诗人与当政者的政治分歧与反对的态度。《正月》、《十月之交》、《节南山》和《瞻印》等诗，把周幽王时代的社会矛盾形象地揭示出来。诗人指责周幽王宠幸褒姒，重用佞臣尹氏太师、虢父卿士等；斥责尹氏、虢父排斥贤才，饰非拒谏，贪鄙自私，妄自尊大，痛斥褒姒毁灭了“赫赫宗周”。总之，误国的君臣把周王朝搞得岌岌可危，天下大